

试述抗战时期的《东南日报》

何扬鸣

内容提要 《东南日报》是抗战时期在东南地区的一份著名报纸,为宣传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叙述了该报在8年抗战中艰辛备尝的播迁历程;为全面抗战、坚持抗战、抗战胜利所做的宣传;专门分析了该报所办的一个著名副刊《笔垒》;还检讨了该报对中共的矛盾态度。

关键词 《东南日报》 《笔垒》 宣传抗战

1937年7月7日,北平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枪声,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正是《东南日报》跻身了全国性的大报行列,为世人所注目的时期。卢沟桥的枪声打断了它的正常发展,使它从顶峰往下滑坡,开始了它的磨难时期。然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东南日报》历史上最值得称赞的时期。

—

淞沪战役期间,杭州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是《东南日报》仍照常出报,迅速及时地报道抗战的消息。敌军在乍浦登陆后,中国军队全线崩溃,杭城也危在旦夕。《东南日报》决定迁社。社长胡健中,总编辑刘湘女、编辑课长金瑞本及电讯股印刷股重要职员工友,则仍留杭工作,设法每日在杭州发行号外,直至12月22日。两天后杭州沦陷。

· 147 ·

11月18日,《东南日报》发表了社论《本报暂迁金华》,向各界读者解释《东南日报》为什么要撤退离杭的原因,说离杭迁金仅是一种战略撤退,是为了蓄积文化火力,准备持久抗战,把报纸的一字一句都变成枪火炮弹,与日寇周旋到底。“今吾人挥手别矣!八婺山水,相距匪远,本报当充分利用邮递,藉与杭市读者如旧见面,而吾人身虽在婺,精神固仍在杭,但愿此去仅为小别,他日湖山无恙,囊笔归来,话小劫之人天,叙阔离之情绪,愿共读者益矢精诚,以迈进于民族复兴之大道!”11月19日,《东南日报》再次发表了社论,重申了上述的意思和决心:“此本报于迁婺之余,感怀过去,瞻瞩未来,一棹双溪,徘徊独切,缅中流之击棹,指白水以为盟,从是发奋为雄,湔复前耻,所愿与我两浙同胞,相期共勉者也。金华古称文物之区,年来公路铁道,四通八达,已渐次蔚为东南文化之重镇。北山峥雄,婺江滔涌,尤足以振奋我文化阵线之士气,是殆我东南民族文化复兴期之安哥拉乎?愿自今日始,与我东南人士,以最迈步向此艰难荆棘之大道挺进。”这两篇社论写得十分悲壮,读后令人百感交集。

《东南日报》的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创办于1927年。经过10年的惨淡经营,《东南日报》在杭州庆春路众安桥建成一座宏伟的报社大楼,其规模即为当时全国同业之首,印刷设备全部进口,是国内新闻同业中第一家使用轮转机印报,早于上海老牌《申报》、《新闻报》等实力雄厚的大报,令同业刮目相看。至1937年,发行由东南各省推至全国,“即欧美日本亦有经常订户”,销数增至5万份以上,位于《申报》和《新闻报》之后。社长胡健中曾于1937年

《本报暂迁金华》,《东南日报》1937年11月18日。

《本报迁金出版》,《东南日报》1937年11月19日。

《东南日报社务概况》,1948年3月10日,藏于浙江档案馆。

撰文写道：“吾人检阅过去，把握现在，而瞻望将来，觉初基既固，前程正远，惟吾人初不敢以此自满，盖信夫自满乃进步之大敌，吾人但知努力迈进，始终不懈，以吾人往日工作与其代价视之，尤深信夫前途之光明。雄驹在途，吾人今又扬鞭行矣！邦人君子，幸辱教焉！”这是《东南日报》历史上最盛时期，报社同人对前途是踌躇满志。

抗战的爆发，打断了《东南日报》的发展。从1937年8月5日起，报纸缩减篇幅，从原来4大张改为2大张，即将原来第三四张中的所有副刊《沙发》、《社会服务》、《商情》、《画刊》等稿件，一律酌量归纳于一二两张之中。当时，报社还以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措施，表示一旦困难稍纾，当即恢复原状。然而，就从这次调整起，《东南日报》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节假日外，再也没有恢复过日出4大张的状况。11天以后，战局日趋紧张，《东南日报》再次压缩篇幅，每日只出版一大张。金华的环境比杭州更差，《东南日报》金华版创刊时，仅为直式一张，就像《东南日报》在纪念该报迁金华出版一周年时所说的那样：“按去冬本报初迁金华，以历劫之余，凡百设备，均极简陋。销数既形锐减，收入尤感微薄。当此之时，吾人几惶然不知何以措手足。”当本报在杭时，以十载经营，新式生产工具，差称完备。迁金出版后，微特上项工具，损失无法补充，即可补充，亦绝非工业条件贫薄如金华者所能容纳。本报现所使用之生产工具，泰半羸劣，较诸昔日，直不啻相隔半世纪。”

《东南日报》迁移到金华后，人们鉴于日军气焰嚣张，都劝《东南日报》西移，国统区也盛传该报将迁到湖南或湖北，有的甚至说报纸将迁到云南或重庆。从报纸本身考虑，若迁移到工商发达、交

《东南日报小史》，《浙江青年》第3卷第3期，1937年。

《本报迁移金华出版一周年纪念日献辞》，《东南日报》1938年11月19日。

通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势必对报纸发展有利。但《东南日报》拒绝西迁,它在湖南湖北的报纸上刊登启事,阐述其立场,表示誓死守住东南这个最后文化堡垒。它说,它在浙江刊行了10年,“与两浙人士休戚相共之谊,痛痒相关之情,久而弥笃,危而益挚,临难苟免,义不当为,且妄思苟全,又无以自解。是故困守金华,保此残垒,虽厄于环境,不能广拓销路,增加纸张,扩大篇幅,然已决心效死勿去,支持到最后之一刹那,以与浙土共存亡”。《东南日报》在8年抗战中自始至终在抗战前线出版发行,也是抗战8年中唯一一份在抗战前线出版发行的大报。

《东南日报》在金华支撑了4年多时间。这4年多时间,虽屡遭日军的威胁,但业务仍能日趋稳定。1942年5月间,浙赣战役爆发,日军进攻金华,《东南日报》才撤至江山,嗣后复由江山经硖口、二十八都、浦城、水吉直至福建南平。自5月21日撤离金华以迄8月21日在福建复刊,计时3个月,自金华辗转播迁至南平,计程千余里,员工及家属将近千人,间关跋涉,远道奔波,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中途被炸死、失踪以及积劳病逝者,竟达62人之多。而且,他们刚到南平时,因经过长途辛苦的跋涉,职工及家属贫病交迫、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受到轻蔑和侮辱,甚至还曾被军统江山站诬认为汉奸间谍集团。

另一路迁移至丽水,出丽水版。丽水版原本创刊于1941年日军渡钱塘江窜向金华之际,自5月1日至8月31日仅维持4个月,后因金华局势渐趋稳定,暂行停刊归并。浙赣战役爆发后,丽水版恢复。丽水版又于1944年12月8日改为云和版。从丽水版至云和版,首尾5年,除1941年因自动停刊外,中间因丽水沦陷而停刊两次,因社屋被炸而停刊一次,每次播迁,报社物资损失均极

《本报十周年纪念》,《东南日报》1938年4月27日。

惨重,员工及家属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1943年3月30日和31日、4月1日,日军接连3天对丽水进行狂轰滥炸,《东南日报》丽水版于3月31日和4月1日,两次被袭击,编辑部、电讯室、职员宿舍及机器仓库,完全炸毁,无法工作,不得已于4月1日起暂时停刊。他们在废墟中重建新屋,整理工场,补充器材,奋斗了10天,于4月11日起恢复出报,发表社论《以复刊答复轰炸》。社论说:“本报开支全赖营业收入,在现时物价高昂成本加重之日,本已入不敷出。经此打击,损失重大,更有‘雪后加霜’之感。但‘我们是倭寇最大的敌人’,六年来我们的笔垒墨堡,始终摆在第一线。六年来用我们的笔锋,不断地于敌人以严重的刺击。六年来我们工作的累积,在一般人看来,仅是数千万张薄纸,而在敌人看来,却不啻数千万枚炸弹。因此恨之切骨,而给我们的损害也最惨重。抗战到现在,我们的损失是一串庞大的数字……如果把这些数字拿来和这次轰炸作一比较,则此番本报的损失实微小而不足道。而且‘我们是倭寇最大的敌人’,所以我们冷静地忍受敌机的轰炸,并泰然地接受这次损失”。“本报为一不设防之纸寨,过去如此,今后依然。‘我们是倭寇最大的敌人’,今后敌机也许要继续轰炸本报;而为着前方数十万军民的精神食粮,为着继续不断予倭寇以严重的打击,我们不撤退,我们不迁移,我们更不躲避。一日本报不炸毁,我们工作一日;如果再把本报炸光了,我们若尚剩一分力量,一定立刻复刊,而这一次便是明显的例证!”

原打算暂别杭州,但最后一别竟是8年。8年中,《东南日报》播迁历劫,艰苦备尝,物资损失之浩大,员工及家属牺牲之惨重,在国统区报界中当推首位。8年中,《东南日报》没有垮过,不断地遭

《以复刊答复轰炸》,《东南日报》1943年4月11日。

受打击,不断地掘起。除杭州版外,它还先后发行了金华版、丽水版、云和版、南平版。8年中,《东南日报》的销数也不小,如南平版的销数,除各省不计,仅福建就遍及了各县各乡镇。南平版和云和版加起来,日销3万余份,可谓“一纸所及,遍及东南”,“一方面虽有都市之丧失,另一方面则正作乡村与边僻区域之深入。”

二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后,浙江省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对此,《东南日报》予以及时报道:《芦沟桥日军挑衅,本省各界同伸义愤……省农业会商会等联电激励宋哲元,杭小学校长筹款慰劳抗敌将士》、《浙江省党部,电二十九军诸将士,率两浙民众为后盾……本省各界对保国土忠勇将士纷起响应》、《前方接战激烈,后方应努力准备,省市当局连日召开紧急会议,绸业公会筹募防毒面具药品,各职业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平津陷落应战开始,本省各界奋起应付,省会抗敌后援会昨开执委会分配工作,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壮悲穆肃,昨省会各界追悼佟赵二将,参加机关团体代表五百余人,派队乘车绕行全市散发传单》、《节衣缩食以储物力,作长期抗战后盾,浙省抗敌后援会电告民众,即日起实行节约广事积储》……

以上这类文章在《东南日报》上比比皆是,对无论是促使政府当局尽快把工作重心转入战时轨道,还是广大人民作好心理准备,都很有必要。同时,《东南日报》几乎每天发表抗战的社论和专论。如:《准备全面抗战》、《为日本违约挑衅,昭告世界友邦》、《准备自

转引之蔡德邻:《抗战时期 东南日报、浙江日报 南迁片断》,《浙江方志》1990年第4期。

卫》、《论北平芦沟桥之守战》、《严守国家立场》、《发动全面抗战》、《抗战胜利之先声》、《以全人格者图生存》、《论抗日战略》、《国民心理的测验》、《速战与持久战》、《积极抗战与长期准备》、《能战而后能和》……综合起来,这些言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要全面抗战。7月15日,《东南日报》针对日军反复无常,调兵遣将,不肯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情况,发表了题为《准备全面抗战》的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全面抗战的问题,并希望集中全国的力量,加紧作好全面抗战的准备,以应付局势的突然恶化。7月27日,《东南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发动全面抗战》的社论,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国内一些人的和平幻想,指出:“国难以来,邦人对敌国外患的压迫,是吞声咽声地尽量忍耐着,而今事实证明,忍耐已经不是办法了,‘挨打’式的抗战,也须由消极的转变为积极的了,就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号,也有重新估计其价值的必要”。“含生之道,莫不知为自卫而抵抗。现在国难日亟,已到了全民族非拼命不可之时,自卫、抗战,总是千真万确的出路。”由于《东南日报》在抗战前夕正处鼎盛的发展时期,跻身了全国大报的行列,在全国,尤其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东南沿海地区,拥有广泛的读者,其抗战的态度和言论,对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需要一提的是,《东南日报》鼓吹全面抗战,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的立场是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过。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敌,响应日本灭亡中国的“近卫三原则”。在国统区新闻舆论还奉令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东南日报》率先发表社论对汪精卫的卖国求和言行予以抨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和重视。

第二,鼓吹持久抗战。8月4日,《东南日报》发表了题为《论

《发动全面抗战》,《东南日报》1937年7月27日。

抗日战略》的社论,指出:“中华民族之对日抗战,能否获得最终之胜利,在战略运用上,关系至为重要。”文章分析说:“(一)就空间言,此次日本侵华,系倾举国力量,我方抗战,更宜全国一致,故战事不发动则已,而一经发动,即非局部的而为全面的战争;(二)就时间而言,日本利速战,而我则利于持久战,故国民对战局发展,目前不用焦躁,而一时小胜小负,尤宜认为无关于终局之得失;(三)就性质而言,对日战争为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之战争,故在战略方面,当与帝国主义相互间战争所采取者不同;(四)就范围言,战争胜负之取决,不仅为军事上之角力,而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总动员之力量,所关尤大。”8月10日和11日,《东南日报》又发表了《速战与持久战》和《积极抗战和长期准备》两篇社论,进一步从国内外诸种因素上论述持久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文章精辟地指出:“战事一开始,敌方必采‘速战速决’的猛烈进攻方式,企图一举使我溃蹶不振,这所用的是刚性战略,与我方的柔性战略不同,柔性战略利于战争的持久,并不希望一举取胜,它一面以游击战术困恼敌军,一面利用敌国政治经济的弱点,静待其内部起了激烈变化之功。这样的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以柔克刚的,战事既必然爆发,自无须汲汲于迟早的一时问题。”

抗战时期《东南日报》的副刊《笔垒》,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报纸副刊,在国统区享有很高的声誉。它在文学艺术方面,宣传抗战思想,透露一些人民的呼声和一些民主自由解放的信息,团结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教育和培养国统区进步青年,尤其是进步的文化青年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抗战时期《东南日报》的声誉与《笔垒》的成功是密不可分的。《笔垒》创刊于

《论抗日战略》,《东南日报》1937年8月4日。

《速战与持久战》,《东南日报》1937年8月10日。

浙江金华,时间是1938年2月7日。那时《东南日报》从杭州撤到金华后刚喘了一口气。《笔垒》的发刊词指出:

这是我们以笔墨筑成的新的堡垒。

如果文人的一杆笔真个可以等于若干支毛瑟枪,让我们把枪口对准敌人的胸膛放射!如果所谓“一字之贬”当认比斧钺还要锋利,让我们紧握这利斧来劈掉汉奸们的脑袋!如果一首诗一曲歌能唤醒我们的国魂,能使我们为国捐躯的英雄垂诸不朽,那更让我们绞尽我们的脑汁!

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战垒,但假使我们据守其中,效死勿去,安知这不是我们东南文坛上的“马奇诺”战线?文坛上的斗士们呢,大家来誓死守住这个据点!

这篇没有署名的发刊词是社长胡健中执笔的,虽然很短,但是写得慷慨激昂,富于激情,很有感染力,尤其“效死勿去”一词在报社中流传开来,影响很大,成为报社中的一句口号。

在《笔垒》上经常有民主人士和著名新老作家的作品发表,如冯玉祥、靳以、王西彦、羊枣、陈伯吹、王造时、王季思等都经常替《笔垒》写稿。《笔垒》的编辑何永德、陈向平等也为《笔垒》写了数百篇文章。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宣传抗战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笔垒》上曾有题为《人类之耻——朝鲜妓女学校参观记》的文章,说的是在朝鲜平壤光练亭附近有一座日本人专门培养朝鲜妓女的学校,那里衣衫褴褛,胡鬚满目,一副贫弱脸颜的乐师们,刻板地移动着手,揉着胡琴、瑟箫、长鼓、大鼓,20多位少女,则载歌载舞,唱着《宫廷宴夜曲》。教师是一位60岁左右的名叫朴明河的女人,她从13岁起就以神女的身份出现在平壤了。在另一间教室

《发刊词》,《东南日报》1938年2月7日。

里,有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少女,在作着古风的“剑舞”。这个妓女学校有学生120名,每年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七八十名,大凡快要毕业的一班,都要来一次“美人”的选举。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时,还强迫大批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作日本士兵的性奴隶。这是铁的事实。如今,日本一些政要接二连三地大放厥词,为日本政府的“慰安妇”政策辩护,说这是公娼制度带来的结果。这篇文章有力地揭露了日本一些政要的无耻谰言。

《笔垒》上的文章呼吁坚持抗战,鞭挞反共倒退逆流,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未来光明的憧憬。编辑钱今昔来自上海,1943—1944年间,他在《笔垒》上以连载的方式写了14篇总标题为“上海风景线”的通讯报道,内容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翌年4月他在上海目睹日军和汉奸血腥屠杀人民,剥削欺压人民的情况。在写作“上海风景线”时,中共地下党员陈向平和钱今昔就经常讨论如何提炼素材、突出中心,掌握明攻日军汉奸,暗刺国民党顽固派的手法和分寸。陈向平也曾用“双溪一士”的笔名写了多篇反映浙赣线撤退概况的报告文学,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队的野蛮罪行,反映了人民的痛苦,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

《东南日报》在抗战时期所作的抗战宣传,是认真、严肃,颇有成绩的,许多方面,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乏真知灼见。这些我们都应该予以肯定。

三

8年抗战时期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7月9日,红军通电请缨赴前线抗日。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

张十方:《人类之耻——朝鲜妓女学校参观记》,《东南日报》1939年2月4日。

赴华北、华东、华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些,号称“中间偏左”的《东南日报》都有较详细的报道和评论,如:《国府下令减刑,释放陈独秀,入狱三载深自悔悟,究其既往藉策将来》、《陈独秀出狱,将谒中枢当局请训》、《朱德彭德怀就八路总副指挥,改编已峻,东进杀敌,誓灭日寇收复失地》、《朱彭就职感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取消赤化暴动停止没收土地,取消苏维埃红军编为国军,团结御侮挽救危亡》、《对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蒋委员长发表谈话,愿在三民主义下抗敌御侮者,无分派别政府无不开诚接纳》、《所部集中听候改编,项英抵南昌请示,表示服从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赣党政纪念周,项英演说,精诚团结发挥力量,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访叶挺项英》……

从上述报道和评论的标题可以看出,《东南日报》在抗战爆发初期报道中共方面的情况完全是站在“正统”的地位,居高临下地作了错误的理解和解释。这点,1937年9月13日的社论《朱彭就职感言》更可明证。社论说:“夫以赤军之窜扰频年,流离转旋,际水尽山穷之时,作翻悔投诚之计。此盖积无数颠沛困苦之经验,始觉悟共产主义之不适于中国,始情愿放弃其过去错误之主张,以毅然走上三民主义救国之大道。此一觉悟,可证其实党理论之正确性;而共党之所以终于转变路线,皈依本党,要即说明此正确性的理论之最后战胜。从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阶段斗争,不容存在!倔强如共党,而有此觉悟,庶几国民革命乃真走上顺利而光明之坦途乎?”

但不管怎样,《东南日报》还是对国共合作表示拥护,对八路军、新四军寄予希望,称“此一支以擅长游击战略著称于世之生力

《朱彭就职感言》,《东南日报》1937年9月13日。

军将有如何惊人之功绩表现于后乎？吾人拭目以俟之。”事实回答了疑问，不久，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全歼日军千余人，取得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首次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为之振奋鼓舞。9月28日，《东南日报》报道：《浙江省党部，电八路军祝捷，克敌平型倭虏斩俘殆尽，尚祈乘胜长驱复我失土》。几天后，题为《守住山西》的社论又分析了平型关大捷的意义：“这一仗的可纪念处，是将山西战场敌军主力的第五师团打得落花流水，是使板垣避开雁门天险而乘隙袭入山西长城内线的计划为之粉碎。”之后，有关八路军的消息不断地在《东南日报》上出现，如《八路收复平鲁向西北推进》、《八路军仍在雁门关外游击》等等。至于平绥线战地记者何永德对八路军的报道就更多了。1939年，周恩来对东南数省进行抗战视察，为此，《东南日报》作了一系列报道。这无论对扩大周恩来当年东南之行影响，还是今天了解他的东南之行，都有意义。如1939年4月2日，《东南日报》就有这样一篇文章：“周氏在浙西公毕后，即往绍兴原籍一行，业于4月1日上午遄返金华，今明日即离浙转赣。记者再赴旅邸访问，据谈，本人此行，途行淳安、桐庐、分水、于潜、萧山、绍兴、诸暨等县，并登天目山，印象良佳。浙东西一般民众抗战情绪热烈，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之声浪响彻云宵，且浙西来自沦陷区域之青年干部，正磨励（砺）以须，时作慷慨悲歌之词，有不复河山誓不休之慨。”周恩来认为“大禹王与越王勾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他希望“吾浙人士，应提高战斗精神，以保卫此后家乡”。

同时，共产党人写的文章也不时地在《东南日报》上出现，如

《朱彭就职感言》，《东南日报》1937年9月13日。

《守住山西》，《东南日报》1937年10月5日。

《周恩来返抵金，今明日即转赣》，《东南日报》1939年4月2日。

1938年10月21日,《东南日报》有一篇叶剑英的专载《论日寇进犯华南》;1940年2月16日,第558期的《笔垒》上,有高岗写的一篇文章《战争教育了人民》。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作为国民党报纸的《东南日报》在这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反映,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章和言论时有出现,如1940年年底,发表了两篇题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和《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社论写道:“即使某一军队发生违反军纪之事件,则其心理基础上已为反常之行为,反统一之行为,必须受命令之制裁,制裁之无效,则应以国家最高军事行政权力绳其后”。“假使任何军队有违反统帅之命令,即不啻直接破坏军纪,间接违反国法,为国家及人民之共同奸蠹;假使任何军队有危害抗战便利私图者,即为妨碍统一,阻滞胜利,衡之于抗战建国纲领之条文,衡之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标,皆在必议必罚之列”。“假使今日犹有某种党派之人士,以取得党派之地位与权利为得计,而不顾民族全体之利害与存亡者,则为自私自利之企图;又假使今日犹有某一集团之部队,以乘机扩张其防区与实力为得计,而破坏军事行政之系统与法令者,则为大奸大蠹之行为,充其企图与行为之所及,必至牺牲民族利益,破坏抗战计划而后已。”

皖南事变发生后,《东南日报》对中共和新四军进行了无耻攻击和诬蔑,极力为国民党评功摆好,极力为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开脱,如社论《严由军纪处置叛军》、短评《对新四军叛变问题》等就大放厥词称:“新四军最显著之叛迹,为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的方案则延宕

转引自(《严由军纪处置叛军》,《东南日报》1941年1月19日)。

不遵,而岂意以非法越轨扩充实力为常图,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不特自由行动,抑且使抗战力量如冰炭之相消;综观各地历次大小不幸事件,皆托于人多饷少之妄说,而实行不遵中央编制,自由扩充部队,其饷额有所不给,则就地征取;此皆摩擦事件之根本,非法行动之事实也。试问以如此不守战区范围之自由行动,以如此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之用心,以如此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之叛迹,以如此不打敌人专并友军之集团部队,其最后居心何在?最大作用何在?最恶影响如何?任何人皆可片言置答。”

总之,抗战期间《东南日报》对待中共的态度比较矛盾。这种现象,不仅抗战期间存在,即使在其他各个时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究其原因,这与《东南日报》是国民党的报纸,其基本立场属国民党的,和报社标榜“文人论政,中间偏左”的方针,报社内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有关。

(作者何扬鸣,1957年生,浙江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严由军纪处置叛军》,《东南日报》1941年1月19日。